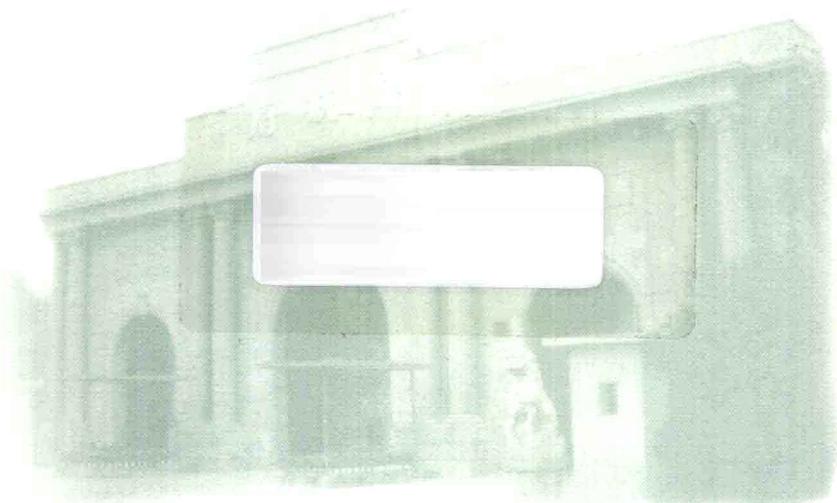


CSSCI来源集刊
总第23辑
2013年春季号

STUDIES ON REPUBLICAN CHINA

民國研究



社会 科学 文 献 出 版 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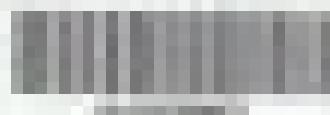
THE
WORLD
OF
ART

ART

ART

ART

ART



CSSCI 来源集刊

民国研究
STUDIES ON REPUBLICAN CHINA

2013 年春季号 总第 23 辑

主编 / 张宪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研究.2013年·春季号：总第23辑 / 张宪文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5
ISBN 978 - 7 - 5097 - 4556 - 4

I. ①民… II. ①张… III. ①中国历史 - 现代史 -
研究 - 民国 IV. ①K25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80350 号

民国研究

(2013 年春季号 总第 23 辑)

主 编 / 张宪文

出版人 / 谢寿光

出版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电子信箱 / jxd@ssap.cn

项目统筹 / 徐思彦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宋荣欣

责任校对 / 李 敏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8

版 次 /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字 数 / 329 千字

印 次 /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4556 - 4

定 价 / 3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人物与思想

- 知识分子与革命：陈天华的困境与历史之困 王瑞成 / 1
“民主共和”抑或“君主立宪”
—— 阎锡山在民国初年的政制选择 张文俊 / 20
新视角下蒋介石与联俄政策的考察 陈志刚 / 30
陈立夫在教育事业上的中西抉择
—— 以其教育部长任内为考察范围（1938～1944） 陈是呈 / 43

大学史研究

- 多重因素驱动下的校内风潮
—— 1921年中国公学风潮述论 严海建 / 59
为国育才 自强不息
—— 抗日战争时期的福建协和大学（1938～1945） 彭淑敏 / 75
知中国 服务中国
—— 南开经济研究所社会经济调查述论 孟玲洲 / 96

社会史专题

- 济南广智院与民国社会生活 张德明 / 112
扶轮社与民国社会初探 刘本森 / 125
邮政发展与中国近代社会交往方式的转型刍议 田 明 / 141

专 论

- 南京国民政府与西北地方实力派的冲突与调适
——以“孙马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柳德军 / 157
领海划界与捍卫海疆主权
——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三海里令”成因论析 刘利民 / 172
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华北日伪军的宣传工作 翟意安 / 187

学术综述

- 中国近代警政史研究综述 段 锐 / 201
中华民国史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卫平光 / 219
纪念王光祈先生12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评述 赵崇华 / 230
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研究高层论坛与会学者
发言摘编 孙 扬 柳德军 整理 / 243

史料视窗

- 美国驻南京领事馆文献选译之四
——关于美国商标在华保护问题 得 一 译 / 254

稿 约 275

Contents

People and Ideas

- The Intelligentsia and the Revolution: Chen Tianhua's Dilemma and
the Predicament of History *Wang Ruicheng* / 1
- "Democratic Republic" or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Yan Hsishan's Choice of Political System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Zhang Wenjun* / 20
- New Perspectives on Chiang Kai-shek and Policies on an Alliance
with Russia *Chen Zhigang* / 30
- Choosing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Education: Chen Lifu's Words
and Deeds during his Term as Minister of Education (1938 -1944)
Tan Chee Seng / 43

Research on University Histories

- Campus Upheaval Driven by Multiple Factors: On the 1921 Student
Strikes in China's Public Schools *Yan Haijian* / 59

Cultivating Talents for the Country and Striving to Improve Oneself:

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1938 – 1945)

Peng Shumin / 75

Knowing China, Serving China: The Nankai Economics Institute's

Social Surveys

Meng Lingzhou / 96

Topics in Social History

Christian Museums and Civic Life in Republican China:

A Study of the Tsinan Institute

Zhang Deming / 112

The Rotary Club and the Society in Republican China

Liu Bensen / 125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stal System and Changes in Communication

Patterns in Modern Chinese Society

Tian Ming / 141

Monographs

Clashes of Interest and their Adjudication between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Northwest Military Clique:

The Sun-Ma Incident as a Case Study

Liu Dejun / 157

Marking the Boundaries of Territorial Waters and Defending the

Sovereignty of Coastal Borders: An Analysis of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Order of Three

Miles” by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Liu Limin / 172

CCP's Propaganda Work Targeting the Japanese Troops and the

Puppet Troops Camped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Zhai Yian / 187

Scholarship Reviews

An Overview of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Police Administration
in Modern China

Duan Rui / 201

An Overview of the Academic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Republican China

Wei Pingguang / 219

A Commentary on the Academic Conference Commemorating
Wang Guangqi's One Hundred Twentieth Birthday *Zhao Chonghua* / 230
Proceedings of the Sun Yat-sen and the Nanjing Provisional
Government Research Forum , Including Presentations Excerpts

Sun Yang Liu Dejun / 243

Insight into Historical Materials

Selections from the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in Nanjing

Archives Part IV : On Protecting U. S. Trademarks in China

Deyi (Translator) / 254

Call for Papers

/ 275

【人物与思想】

知识分子与革命： 陈天华的困境与历史之困

王瑞成^{*}

提 要 新式知识分子和中国革命均是近代史上新出现的突出现象，两者之间的关联，很难简单纳入革命叙事。从知识分子到职业革命家的身份角色转换是这一话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辛亥革命期间留日学生和革命领袖之一的陈天华，具体呈现了知识分子到职业革命家身份转换面临的困境：大众化和化大众的困境、反帝民族主义与排满革命的困境、知识分子个体与集体融合的困境。最终没有走出困境的陈天华陷入蹈海而亡的绝境。陈天华代表了没有完成知识分子到职业革命家身份转换的那部分知识分子，而其面临的困境也是中国近代历史面临的困境之一。

关键词 知识分子 革命 陈天华 困境

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杨天石先生在一次谈话中称：辛亥革命领导者应为“平民知识分子”。因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实际上是一批青年学生，留学生或者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也就是19世纪末年至20世纪初年在中国出现的新型知识分子”。^① 杨先生这一判断可能意在将辛亥革命领导者的定性从阶级属性引向社会属性，其背后牵涉到知识分子与革命这一大问题。^②

* 宁波大学历史系教授。

① 《东方早报》2011年4月13日，杨天石在《帝制的终结——简明辛亥革命史》（插图本）（岳麓书社2010年4月版）一书的前言中有更详细的论述。

② 有关辛亥革命的研究也涉及社会经济方面，但主要还是为政治革命建立社会经济背景，或者是革命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属于政治史研究的扩大版或拓展，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史与社会史的会通。其实，自社会史视角看政治革命，我们关注的是革命参与者的社会属性及其在革命这一极端环境下发生的变化。比如常态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如何转变成革命者或职业革命家。革命组织中的成员主要不再体现社会属性，而是体现政治属性，成

有关知识分子与革命的特殊历史现象，其实不乏关注。但大多是自阶级属性所做的判断和分析，诸如革命语境下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定性，以及软弱性和依附性等特征的概括。或者知识分子投身革命成长为革命者的事迹。^① 近年来有学者自社会属性分析四民社会解体后，知识分子边缘化和边缘知识分子的取向与出路问题，间接涉及知识分子与革命问题，其中特别提到要注意对“职业革命家”的研究。^②

准确地讲，领导革命的不可能是知识分子这个社会阶层或群体，而是职业革命家。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大多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职业革命家。知识分子和革命的结合，还需要一个身份转换的过程，即从知识分子到职业革命家。但我们的历史研究还基本停留在对职业革命家和知识分子分别关注和论述的状态，对知识分子与革命之间的复杂关系和身份转换历史过程还缺乏了解，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能否实现这一转换，有多少实现了转换，以及这一转换过程中存在什么问题，就成为新的研究论题。一旦涉及历史过程，抽象的讨论就失去意义，需要具体的历史实证。

本文尝试在知识分子与革命这一问题意识之下，具体解析陈天华这一个案。之所以选择陈天华，主要是因为这一个案包含的丰富内涵。陈天华代表的是没有能够完成从知识分子到职业革命家身份转换的实例，这较之完成转换的职业革命家透露的问题更值得深思。^③ 在陈天华悲剧性人生背

为纯粹的政治人。在一定意义上，革命者有一个脱离常规社会投身革命，去除社会属性，强化政治属性的过程。这是革命史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自社会史视角重审革命可以发现的新历史内涵。

- ① 知识分子与革命并非辛亥革命史的专题，也没有明确成为一个问题。涉及这一方面的研究散见于辛亥革命通史著述、人物研究和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历史研究中。
- ② 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开放时代》1999年第4期。
- ③ 许许多多投身革命洪流而没有实现身份转换的历史参与者，已经消失在历史研究者的视线中，我们能记住的往往是成功者。而置身于革命之外的知识分子更是不在少数。对陈天华的关注主要是其与革命主题吻合的部分，其次就是其蹈海而亡这一特异行动的原因追究。而陈天华游离于革命主流之外的部分，以及其与革命之间的微妙关系，则较少关注，甚至不无误解误读之处。相关研究参见孙志芳《陈天华的爱国革命思想》，《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62；陈旭麓《论陈天华的爱国民主思想》，《近代史思辨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林增平《陈天华传》，戴逸、林言淑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杨天石《陈天华〈要求救亡意见书〉及其被否定经过》，《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吴宇《“革命党之大文豪”陈天华何以一度产生改良思想》，《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刘宏章《陈天华思想评价的若干问题》，《求是学刊》1986年第2期；刘真武《陈天华蹈海捐躯因果论》，《河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张显菊《试论陈天华蹈海》，《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9年第1期；陈一容《陈天华蹈海自殉探因》，《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后，有许多历史之谜尚未解开。是什么导致陈天华陷入困境乃至绝境？需要我们在有限的历史信息当中勉力寻找答案。^①

一 大众化还是化大众：启蒙精英与大众之困

辛亥革命史研究中有一个一般性结论，即革命失败是由于没能充分动员民众，这显然是与后来成功的革命相比较而言。辛亥革命的失败并不意味着革命者无意动员民众，其中包含的问题远非成败经验教训总结那样简单。

辛亥革命时期知识阶层和知识阶层之外的大众动员已经为革命领导者充分关注。孙中山通过洪门和同乡关系在海外华侨中的革命动员卓有成效，这给革命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人才和舆论支持。日本留学生中革命动员非常充分，可以说是革命派势力占据绝对优势。而国内知识界、会党的革命动员也造成一定声势和影响力，新军的运动更是形成了革命最重要的武装力量。知识阶层领导的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运动起来，并最终达成推翻清朝统治的目的，与其社会动员密不可分，或者说，就排满革命而言，这一时期的民众动员是有效的。但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言，其民众动员是不成功的。在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度，如何充分动员民众参与民主革命，就成为一个问题。这一问题概括起来就是革命语境下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复杂性在革命宣传的文本中有充分的呈现。

革命初期的宣传最有影响力的就是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

《猛回头》写于 1903 年夏，同年秋《警世钟》完成。

《猛回头》最先发表在《湖南俗话报》。东京《游学译编》再版广告中称：“是书以弹词写述异族欺凌之惨剧，唤醒国民迷梦，提倡独立精神，一字一泪，一语一血，诚普渡世人之宝筏也。”再版版本增加四分之一篇幅。^②《警世钟》时人称采用的是“新闻白话演说体”，但这一演说主要是针对一般大众，实际上类似于弹词说唱中说的部分。^③而写于 1904 年冬，

^① 刘云波《陈天华蹈海原因新析》，《文史哲》2002年第5期。

^② 可能由于早逝，有关陈天华的历史资料留存有限，幸而存有不少文章汇编成《陈天华集》（刘晴波、彭国兴编校《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另有刘晴波、彭国兴编，饶怀民补订《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本文采用的是前一版本），为我们做知识分子与革命的文本分析提供了可资实证的材料基础。

^③ 刘晴波、彭国兴编校《陈天华集》，第 25 页。

^④ 《警世钟》题名之上标有“最新新闻白话演说”，署“神州痛哭人著”，见刘晴波、彭国兴编校《陈天华集》，第 60 页。

直到陈天华弃世尚未完成的《狮子吼》则是章回体演义小说。

从形式上看，三部作品都采用通俗性民间文艺形式，这显然是有意为之。作为革命初期舆论宣传和民众动员的主要人物，陈天华这类作品预设的读者或听众主要不是与自己身份类似的知识阶层，而是下层民众，真正意义上的“大众”。

弹词是民间说唱艺人的脚本，演讲稿是演说的脚本，演义体小说也能作为说书的脚本，主要对象既可以是读者，也可以是听众，尤其是没有阅读能力的下层民众。就语言文字而言，陈天华的三部作品都可以划入白话文范畴。民间文艺本来就是白话形式，但这并非后来白话文运动的先声，也与后来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白话文和新文学有本质差异。^①

新文化运动时期倡导白话文和新文学，而非通俗的民间文艺。白话文和新文学的主要对手是文言文和旧文学。其预设的读者也是新知识分子群体，而非下层民众，大众其实并未真正进入其视野。

白话或口语化，常常会令人联想到大众或大众化，其实，这是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误解。“白话”只是形式，关键是内容，即用白话来说什么，表达什么。一旦进入实质内容，新文化运动时期之白话文或白话文学的精英属性便暴露无遗。新名词、新观念、新情感与当时中国大众的距离，恐怕会超过《红楼梦》中贾府的焦大和林妹妹的距离。精英知识分子的白话文直接针对的还是新知识分子，在学生与老师、新式教育和传媒“圈子内”流传。这一新知识分子群体就中国当时社会构成而言，是小众而非大众。自大众化衡量，白话文尚只及皮毛。就实质内涵而言，文言文所表达的价值观念，与中国大众的关系反而更密切。大众未必懂文言文，但却能理解礼义廉耻；而对不识字的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白话文照样无法阅读，且其中表达的自由、平等、博爱一类概念也相当隔膜。因而，满口“之乎者也”的士人，尚可以建构起四民社会，并在其中居于领袖地位，而“我手写我口”的新知识阶层却退居边缘，^②这一奇怪的现象在新文化圈内人看来却是见怪不怪。但一旦面对真正的大众，难免会产生失望甚至绝望的情绪：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好在纯粹从事思想启蒙和新文化建设的知识阶层，在其内部既有领袖，也有追随的群众，形成完整的社会构造；传媒

^① 相关研究参阅祁和晖《白话文革命早在“五四”运动之前已经开始：近代文学中的白话文运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汪龙麟《近代白话文创作的困境及其自我否定情节》，《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② 前引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一文对此现象有精彩的解析。

和舆论也是一家独大，容易产生“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幻觉。更重要的是，新知识阶层以大众的天然代表自居，直接省略了大众化的复杂过程。因而，作为思想文化运动和新文化建设而言，未必有脱离大众的焦虑感和无力感。但陈天华这样的参与和试图领导革命的知识分子，则无法不面对大众。

政治革命自然包含思想理论建设和舆论宣传，但政治革命不同于文学革命，它是理论见诸行动的实践过程。对此，陈天华有清醒的认识：“近来言论发达到了极处，民权革命、平等自由几乎成了口头禅，还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立宪主义等各种主义。但总没有人实行过。空口说白话，那个肯信。只有舍死做几次。总要有一半开通人先死。不能大家都只想布文明种子。”^① 也就是说，他要从坐而论道的书生，转变为投身革命的领导者。这是知识分子到革命者身份转换所需要的自觉。但要起而行，除了牺牲精神，更重要的是要找到革命的现实力量。知识阶层能投身于革命行动的毕竟是少数，力量有限，因而革命势必要越过社会阶层界限，争取动员下层民众。陈天华的革命宣传三部曲采取民间通俗文艺的形式，体现了动员下层民众的明确意图。

与“新文艺腔”的新文学相比，陈天华的通俗文艺宣传品确实具有触动下层民众的元素。自影响力最大的《警世钟》和《猛回头》看，这两个文本都有一部分试图迎合大众，体现其大众化一面。

《猛回头》以列强带来的亡国危机为切入口，然后叙述汉民族的历史辉煌、宋代的抗金民族主义以及满人入主中原和满人政府沦为洋人朝廷的事实。接下来叙述列强瓜分中国和对中国的欺压羞辱，并分别指出印度、安南、波兰、犹太、非洲、南洋、澳洲、苗瑶亡国或灭种的惨祸。^② 《警世钟》则分别以“苦呀！”“恨呀！”“真呀！”“痛呀！”“耻呀！”“杀呀！”“奋呀！”“快呀！”为起始感叹词，痛诉列强入侵造成的痛苦和屈辱，号召反抗外来侵略。^③

这一部分主要是诉诸情感和情绪宣泄。除了采用唱词和白话口语形式外，还引入中国民众比较熟悉的概念和意象，如：黄帝、“始祖公公”，祖宗、同胞兄弟，大宋的岳爷、岳飞、秦桧，鞑子、鬼子等。此外，这一部分较少说理，而是以史事和故事等具体形象和记忆来表述，其中不乏夸张

^① 刘晴波、彭国兴编校《陈天华集》，第89~90页。

^② 刘晴波、彭国兴编校《陈天华集》，第25~43页。

^③ 刘晴波、彭国兴编校《陈天华集》，第60~75页。

和编造，缺乏学理逻辑。

这种通俗和大众化的努力颇见成效，革命同道对此大加赞赏。

陈天华写作弹词和文章，发表于《俚语日报》，“日与下等社会谈论种、国大事，虽目不识丁者，闻之皆泣下”。^①“《警世钟》、《猛回头》等书，由于咸用白话文或通俗文，务使舆夫走卒皆能了解”，“散播于长江沿岸各省，最为盛行，较之章太炎《驳康有为政见书》及邹容《革命军》有过之无不及。”^②景梅九回忆说：有位姓胡的革命党人，将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吴樾的《宣言书》和章太炎的《排满歌》编成一册，题名《铁券》，并集资印刷了“几千册，销行很广”。后来“各省同志都争着集款印刷，暗暗里输入内地，论效力，较《民报》、《汉帜》还大些”。^③

但如果就此认为陈天华和革命者通过这一方式与大众达成一致则言过其实。如果陈天华的革命宣传品仅此而已，则这样的革命宣传也就等同于制造暴动，谈不上近代革命。知识分子领导的近代革命必然具有自己的政治理念，革命的目的除了推翻清王朝取而代之，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寻一个民主进步的前途。因而，其革命宣传除了革命动员，还具有启蒙性质。在陈天华的三部曲中，新的价值理念也贯穿其中。

在其大声疾呼“苦呀！恨呀！真呀！痛呀！耻呀！杀呀！奋呀！快呀！”之后，他也不得不为自己辩护：“照以上所说，列位一定疑我是疯子，又一定疑我是义和团一流人物。”陈天华辩解说自己生平最恨义和团，“洋人也见过好多，洋国也走过几国，平日极要人学习洋务，洋人的学问，我常常称道的”。“但是我见那洋人心肠狠毒，中国若是被洋人瓜分了，我汉人一定不得了，所以敢说这些激烈的话，提醒大家，救我中国。”^④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又有十个须知：瓜分之祸，不但亡国，还要灭种；满洲政府为洋人压制汉人；只有立即行动，死死苦战，才能救中国；这时多死几人，以后方能多救几人；种族二字要分得清楚；国家人人有份，不能丝毫不管；要拒外人，须先学外人长处；要想自强，先去掉自己的短处；文明排外，不可野蛮排外；排外事业，无有了时。另外还有十条奉劝：做官的人要尽忠报国；当兵的人要舍生取义；世家贵族，毁家纾难；读书士子要会说还要会行；富的舍钱；穷的舍命；新旧两党，各除意见；江湖朋

① 杨源濬：《陈君天华行状》，见刘晴波、彭国兴编校《陈天华集》，第2页。

②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第119页。

③ 景梅九：《罪案》（节录），见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252页。

④ 刘晴波、彭国兴编校《陈天华集》，第73页。

友，改变方针；教民当以爱国为主；妇女必定也要想救国。^①

在《猛回头》中，前半部是讲述亡国灭种危机，后半部提出十要、四学和四不学：“除党见，同心同德”；“讲公德，有条有纲”；“重武备，能战能守”；“务实业，可富可强”；“兴学堂，教育普及”；“立演说，思想遍扬”；“兴女学，培植根本”；“禁缠足，敝俗矫匡”；“把洋烟，一点不吃”；“凡社会，概为改良”；“要学那，法兰西，改革弊政”；“要学那，德意志，报复凶狂”；“要学那，美利坚，离英自立”；“要学那，意大利，独自称王”；“莫学那，张弘范，引元入宋”；“莫学那，洪承畴，狼心毒肠”；“莫学那，曾国藩，为仇尽力”；“莫学那，叶志超，弃甲丢枪”。^②

也就是说《猛回头》和《警世钟》是由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的主要目的是动员大众，诉诸情感，完全通俗化，体现大众化一面；后一部分则是解决危亡之道，主要是说理，体现化大众一面。上述新观念和新知识的表述如果独立来看，与新知识分子的政论没有多大区别，但置于《猛回头》、《警世钟》中，与通俗文艺形式和其他通俗宣传内容合在一起，抽象的说教与通俗文艺体裁的不协调，给人一种别扭和奇怪的感觉。尽管有通俗文艺包装，但两者之间的差异还是能明显感觉到。

《狮子吼》作为中国最早的革命文学作品，也具有这样的特点。这种以章回体演义包装的革命史，给人一种怪异的感觉。从革命宣传角度看，演义体小说让革命者及其行动带有古代侠客义行色彩，有些变形和夸张。自文学角度看，其中大量的议论和知识介绍，以及明显的革命宣传意图，使其文学性大大下降，也使借助通俗小说的通俗性和流行性以扩大革命宣传的初衷大打折扣。这种政治与文学之间的矛盾在后来的革命文学中也一直是个问题。

自文本分析，这三部作品确实是一种奇特的混合体。由于各取所需，这样内容混杂的作品或许波及面更广。^③ 其令人惊叹的发行量和影响力也让后世研究者在崇敬之余，难有质疑余地。但细细分析，不难发现这些作品内在的矛盾和裂痕。^④

^① 刘晴波、彭国兴编校《陈天华集》，第 73~95 页。

^② 刘晴波、彭国兴编校《陈天华集》，第 43~55 页。

^③ 但我们不知道到底是哪部分对下层民众有影响，具体影响如何。

^④ 对陈天华作品的解读各有不同视角，笔者是自大众化和化大众角度进行解读。参阅邱巍《清末俗文学作品与“民族国家”形象的建构：以陈天华的〈猛回头〉为中心》，《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3 年第 2 期；龙华《论陈天华的小说创作：〈狮子吼〉为现实和理想之作》，《中国文学研究》1994 年第 4 期；孙秀荣《〈狮子吼〉——近代启蒙文学的一次尝试》，《河北学刊》2002 年第 1 期。

从陈天华的全部作品看，上述三部属于通俗文艺题材或演说词，而在《民报》上发表的《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中国革命史论》、《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及《丑哉金邦平》等则属于政论文，是论战语境，预设对象是知识阶层中不同政治派别，要表述的纯粹是民主革命的政治理论，属于自己人的内部话语，与大众无关。

一涉及启蒙，革命宣传者则面临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面临的同样的问题。不管是白话文，还是通俗文艺，其包装的新思想和新理论都是外来的，不仅存在中西文化、历史语境和思维习惯的差异，还隔着一层大众和知识精英的差距。

陈天华革命宣传三部曲文本内在矛盾背后是知识分子与大众、大众化和化大众的两难困境。

通俗文艺形式、民族主义情绪宣泄、历史符号的借用，体现的是知识分子大众化的一面，即与民众的贴近和趋同，采用他们喜闻乐见的文本形式，用他们能够理解和容易产生共鸣的话语和观念来表述内容。一句话，就是与大众的趋同。而新思想和新观念的启蒙则体现知识分子化大众的一面。这种精英与大众之间的身份区别，在知识界具有充分自觉。

陈天华和留学生自我身份认同是“学生”。东京人类馆、台湾馆，拒俄运动之义勇队，湖北演讲堂，安徽爱国会，上海爱国学社，学生组织成“完全无缺、颠扑不破之大团体”。陈天华将学生定位为中国之“主人”：“夫学生者，非被举世之推崇而目之为主人者乎？”“各级社会，皆吾主人之兄弟、亲戚也，而知识缺乏，主人得以提携之，输贯之。”“各级社会之无知识也，而学生非无知识。”因而学生要尽主人之天职。“通国之人皆对于亡国之宣告不知所署，一惟主人之马首是瞻。”各类新式学校学生有数万人，其中东京留学生程度最高。留学生受外界刺激，无不有“国家”观念，“而内地则毫无闻见，懵焉聩焉”。“中国之亡，亡于学生”，“中国之兴，兴于学生”。要达成救亡目的，学生要脱离社会常轨，一方面要与社会发生交涉，另一方面又要远离社会大众的蒙昧。^①

启蒙知识分子是通过化大众来达到自身与大众的一致，基本上是单向的同化，虽无矛盾冲突，但能否达到目的，则毫无保证。不过这并不影响其执着努力，并能保证其群体自身内在的一致性。而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是从两方面来影响大众，一方面是迎合大众，适应他们的知识、情感和理

^① 《论中国学生同盟会之发起》，《苏报》1903年5月，见刘晴波、彭国兴编校《陈天华集》，第19~21页。